

《资本论》:马克思的“批判理论”^{*}

白 刚 郜 爽

[摘 要] 作为马克思“倾其一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本质上是一种“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的批判理论。在《资本论》中,通过批判“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马克思揭穿了资本主义普遍性和永恒性的“神话”,阐明了作为“抽象力”的批判的和革命的“政治经济学辩证法”;通过批判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揭示了价值规律的“二律背反”,论证了在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实证性背后存在一个否定性的过程;通过批判“拜物教”,马克思揭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为“颠倒意识”和“掩盖矛盾”的本质,在“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基础上破除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幻象”。正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真正开辟了一条“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取代“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而走向自由解放的道路。

[关 键 词] 《资本论》 政治经济学批判 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劳动价值论 拜物教 批判理论

DOI:10.15894/j.cnki.cn11-3040/a.2019.05.009

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的一生就是在“批判资本主义”中度过的。从青年时期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神圣家族批判”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再到黄金时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哥达纲领批判”,以及晚年批判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马克思从哲学、宗教、意识形态、经济和政治等全方位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批判。马克思的理论本质上就是一种“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并“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批判理论。而这一“批判理论”的最集中体现,就是马克思为之牺牲了“健康、幸福和家庭”的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

一、“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批判: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法

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区分了三种思维:表象思维、形式思维和思辨思维,认为只有区别于表象思维和形式思维的思辨思维,才是真正的“让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资本论》的古希腊思想渊源探究”[项目编号:19AZX00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大项目“当代哲学发展趋向与人类文明形态的哲学自觉”[项目编号:17JJD7200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内容按照它自己的本性,即按照它自己的自身而自行运动,并从而考察这种运动”^①的哲学概念思维。在黑格尔这里,思辨思维既超越了表象思维的“抽象的肯定”,又超越了形式思维的“空洞的否定”,从而实现了“否定之否定”的理解。这也正是马克思后来高度肯定的黑格尔的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但由于黑格尔过分看重和抬高概念和逻辑的力量,让现实服从于逻辑而不是相反,最终走上了泛逻辑主义,只是实现了对现实的抽象的、逻辑的和思辨的表达,由此导致黑格尔在面对现实经济问题时,“通过把具体条件替换为它们的抽象概念,把自我增殖的价值替换为绝对否定性,而把资本这一具有历史规定性的体系转化为无时间的逻辑王国,从而将资本的辩证运动过程永恒化了”^②。在此意义上,庸俗经济学家和蒲鲁东主义者在经济问题上确实是黑格尔哲学方法的“传人”。

对古典经济学家、庸俗经济学家和蒲鲁东在经济学上对黑格尔哲学思辨方法的“套用”和“搬弄”,马克思称之为“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在实质性意义上,马克思之所以批判蒲鲁东以及古典经济学家和庸俗经济学家,是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达到黑格尔思辨思维的水平,仍然是一种沉浸在物质材料里而难以自拔的表象思维,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超脱内容的形式推理。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初涉经济学的马克思就对国民经济学及与其同一立场的黑格尔进行了批判,接着又在作为《资本论》的“入门读物”——《哲学的贫困》中,专门集中对“搬弄黑格尔”的蒲鲁东进行了深入的揭示和批判,后来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资本论》中对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批判,从而具体阐述了《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辩证法。

虽然马克思专门写了本著作——《哲学的贫困》来批判蒲鲁东,但绝不是为了打倒其本人,而是为了同唯心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划清界限,“给力求阐明社会生产的真实历史发展的、批判的、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扫清道路”^③。为此,马克思才决定写一本著作来揭开“搬弄黑格尔”的蒲鲁东的真实面目。也因此,“在该书中还处于萌芽状态的东

西经过二十年的研究之后,变成了理论,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发挥”^④。也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后来才强调《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一起,成了《资本论》的“入门读物”。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集中批判的是蒲鲁东由于“搬弄”黑格尔辩证法而造成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针对蒲鲁东对黑格尔思辨辩证法的任意“肢解”和随意“套用”,马克思一针见血地追问“蒲鲁东先生的整个辩证法是什么呢?就是用抽象的和矛盾的概念,如稀少和众多、效用和意见、一个生产者和一个消费者(两者都是自由意志的骑士)来代替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需求和供给。”^⑤在这里,蒲鲁东把黑格尔辩证法“正一反一合”三个环节的“否定之否定”过程,仅仅变成了“正一反”两个环节的“肯定—否定”的二元对立过程,把辩证法简单化和直观化了。在此基础上,必然导致蒲鲁东撇开劳动和社会关系而对经济关系和经济范畴进行曲解。实际上,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现实生产的社会关系的“抽象”,即其理论表现,而作为空论家的蒲鲁东先生却把关系颠倒了,“他认为现实关系只是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⑥。对此马克思尖锐地指出,蒲鲁东先生得出这个臆造的“极端的结论”,实际上触及的仅仅是那些表达事物的“术语”,而绝不是“事物本身”,“这说明他对修辞学要比逻辑学有才能得多”^⑦。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野出发,马克思入木三分地批评蒲鲁东仅仅是在玩弄概念和术语,而没有面向事情本身。由此可见,蒲鲁东虽然到处搬弄和套用黑格尔的辩证法,但实际上他并没有真正理解黑格尔辩证法的作为创造和推动原则的“否定性”。因此,蒲鲁东仍然与黑格尔站在同一立场,并且“黑格尔为宗教、法等做过的事情,蒲鲁东先生也想在政治经济学上如法炮制”^⑧。在这一意义上,蒲鲁东就是黑

①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0页。

② [英]阿瑟《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高飞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9卷第24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9卷第248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卷第87—88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02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卷第83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01页。

格尔思辨哲学在政治经济学上的“传教士”和“代言人”。

由于不懂辩证法,马克思批判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国民经济学只是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抽象的、一般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实际上它并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所以它不理解这些规律。因此,国民经济学根本无法“向我们说明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原因”^①。这实际上就是国民经济学对黑格尔逻辑的直接“搬弄”和“套用”而掩盖了现实问题。由于搬弄和套用黑格尔的逻辑,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把现实看作只是逻辑的具体体现而不是相反“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②在此意义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包括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李嘉图,都把“资本”和“劳动的资产阶级形式”看作永恒的和自然的(而不是历史的)生产形式,然后又竭力为资本和雇佣劳动作辩护。在这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看不到经济范畴实际上是现实社会生产关系的反映,是一定的生产方式的产物。由此可见,国民经济学家与黑格尔完全是逻辑一致的:黑格尔站在国民经济学立场上,国民经济学站在黑格尔的逻辑延长线上,二者结成了牢固的“神圣同盟”。对此,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观念、范畴和原理,而这些社会关系又来源于相应的物质生产方式,所以,这些观念、范畴和原理也同它们所表现的社会关系一样绝不是永恒的,而是暂时的、历史的产物。^③而《资本论》所要做的,就是运用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法,把经济学从形而上学的基地放回到它的历史基地上,破除普遍永恒资本的“神话”。

正是在黑格尔思辨辩证法和古典经济学实证性方法的基础上,马克思清醒地认识到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④。这里的“抽象力”,既超越了沉入物质中而不能自拔的表象思维——非批判的实证主义,也超越了以脱离内容而骄傲的形式推理——非批判的唯心主义,从而是思辨思维与实证方法的统一——批判的实证主义。作为“批判的实证主义”,这种“抽象力”既具

有马克思自己在《资本论》的《序言》中所说的“叙述的方法”的“先验结构”,又立足于“研究的方法”的“客观实在”。因此,《资本论》本质上既不是一种空洞的唯理论,也不是一种简单的实证论,而是“关乎马克思对观念论中的抽象主义和经验论中直观(事实)的意识形态的人本主义批判”^⑤。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特别强调,《资本论》区别于“神秘形式”的“合理形态”的辩证法之所以会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传教士”和“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就是因为按辩证法的本质来说,它不崇拜任何东西,而“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⑥。也因此,英国新辩证法派代表人物阿瑟明确指出,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辩证法的“真正财富”和实质,“并不是由于某种抽象普遍方法的应用,而是因为物质自身的运动要求相应逻辑范畴的表达”^⑦。所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法”确实实现了以唯心主义的方式——思辨辩证法反对旧唯物主义——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又以新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来反对唯心主义——德国古典哲学。

二、“劳动价值论”批判:价值规律的“二律背反”

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在超越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在《国富论》中,斯密明确表明了“劳动价值论”的两个基本规定:一是劳动创造价值,一切物品的“真实价格”,乃是“获得它的辛苦和麻烦”,世上所有财富,都不是用“金银”而是用“劳动”购买的;二是等量劳动获取等量价值,“一定劳动量的价值”交换有“同量劳动价值的物品”,无论在何时何地,对于劳动者都可以说“等量劳动”有“同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5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98页。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03页。

④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⑤ [美]麦卡锡《马克思与古人》,王文扬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34页。

⑥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2页。

⑦ [英]阿瑟《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5页。

等的价值”。^①在这里,斯密既解决了价值的劳动来源问题,又说明了衡量价值的劳动标准问题。由此可见,在古典经济学这里,劳动价值论的两个基本规定——“劳动创造价值”和“等量劳动获得等量价值”,实际上也是劳动价值论的“两个教条”,一直制约和左右着从斯密到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虽然揭示出了财富的来源问题,但却无法理解和说明劳动的二重性,因而不能区分“生产中耗费的劳动”和“交换中购买到的劳动”,亦即无法区分“创造价值的劳动”和“衡量价值的劳动”。对此,马克思指出:“斯密用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来决定商品价值,但是,他又把这种价值规定的现实性推到亚当以前的时代。换句话说,从简单商品的观点看来他以为是真实的东西,一到资本、雇佣劳动、地租等等比较高级和比较复杂的形式代替了这种商品时,他就看不清了。”^②由此可见,斯密不理解劳动的社会性质及劳动二重性,他把“生产中耗费的劳动”与“交换中购买到的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与“衡量价值的劳动”混为一谈了,他的劳动价值论说到底还是“二元论”的。由此导致劳动对人之自由解放的真实意义,在斯密这里还是模糊不清的。李嘉图对此虽然也有所觉察,但由于固守劳动价值论的“两个教条”,他仍然是徘徊不前的。而通过提出“劳动的二重性”来超越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两个教条”,正是马克思《资本论》的伟大创举。

实际上,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只是论证了财富的源泉问题,进而为资本家发财致富披上了合法性的外衣。所以在古典经济学这里,劳动价值论是实证性的和肯定性的。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批判的“真正要义关注的是关于资本家生产的本质这样一个基本争论”^③,亦即论证资本主义生产的剥削本质。在马克思这里,劳动价值论是否定性的和批判性的。对此,罗尔斯却比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更深谙其意: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主旨”,就是通过挖掘资本主义秩序之外在表象下的深层结构,使人们能够了解工人劳动时间的花费轨迹,从而发现那些使剩余价值——工人阶级的未付酬劳动——能够被剥夺以及剥夺多少的各种“制度安排”。^④也就是说,在马克思这里,作为财富来源的“劳动价值论”必然要走向财

富剥削的“剩余价值论”。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剩余价值理论。

可以说,《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也是一种“劳动价值论批判”,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绝不是一种关于公正价格的理论,而是揭示作为表面上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为何走向了实际的不等价交换的剩余价值规律。这实际上就是建立在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价值规律的“二律背反”:劳动价值论不是有关“衍生价格”的——那是浪费时间,而是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谓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价值规律之异化与拜物教的颠倒而疯狂的机制。^⑤尽管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规律能够批判封建的社会秩序,但它们本身却不能为资本主义的历史批判提供基础。在马克思看来,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在表面的流通或交换领域是自由平等的: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商品交换或流通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⑥但马克思却深刻地认识到表面平等的“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的价值规律背后的实际不平等:“按照商品生产中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规律,‘剩余价值’归资本家,而不归工人。”^⑦在此基础上,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谓的价值规律也就合乎逻辑地走向了剩余价值规律,而剩余价值规律必然会导致贫富两极分化:一极是资产阶级财富的积累,另一极则是受劳动折磨、奴役的工人阶级——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的粗野、无知、道德堕落和贫困积累。^⑧而两极分化的结果,就是马克思强调的资产阶级自掘坟墓并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在当今金融资本狂欢的时代,全球范围内的这“两个积累”依然有增无减。对此,法国学者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利用资本主义近三百

① 参见[英]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6、27、2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453页。

③ [美]罗尔斯《政治哲学史讲义》,杨通进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43页。

④ 参见上书,第342页。

⑤ 参见[英]阿瑟《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5页。

⑥ 参见[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04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9卷第428页。

⑧ 参见[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743—744页。

年发展的历史资料和经济数据来进一步分析证明了资本的增殖规律 $r > g$ (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 这实际上是对《资本论》劳动价值论批判的另一种证明。

对于价值规律走向剩余价值规律的内在原因,古典经济学家看不到也不承认,唯有马克思通过提出“劳动二重性”将其揭示了出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区分了创造商品价值的抽象劳动和创造商品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揭示出在劳动与资本的交换中,劳动力是被全价购买的,其价值也被视为严格服从包括劳动力本身在内的所有商品的劳动价值论,因此劳动者得到充分偿付的是他的劳动力而不是劳动。马克思的这种解释解决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未能系统阐明的,即由实现于产品中的劳动与该产品应得的劳动不相等所造成的问题。也就是说,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所造成的“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走向“不等价交换”的剩余价值规律的“二律背反”,在《资本论》的“劳动二重性”中得到了很好的解决,而这既是马克思的伟大发现,也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①。对此,阿瑟深刻地指出,《资本论》的巨大成就就在于,马克思深刻地揭示出“甚至当资本家支付了使生产得以进行的全部投入的全部价值时,剩余价值依然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②。

可以说,在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实证性背后,有一个否定性的过程。在此意义上,雇佣劳动与其说是“生产性劳动”,不如说是“反生产性劳动”,因为工人实际地或潜在地拒斥资本迫使他们劳动的企图。所以,马克思高于其他经济学家之处就在于他“把劳动价值论重释为否定性的辩证法”^③,揭示出了劳动价值论的自我否定性。所以,《资本论》“劳动价值论批判”的“全部意图”,就是要揭示和证明资产阶级的必然灭亡和无产阶级的必然解放“何以内含于劳动价值论中,以及何以具体化于资本主义的实践中”^④。这实际上正是《资本论》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超越的真正实质所在。对此,马克思强调这是工人阶级的“劳动政治经济学”对资产阶级的“资本政治经济学”的伟大胜利。在此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在《资本论》里,“劳动价值论”不是“关于价值的劳动理论”——价值的劳动来源问题,而是“关于劳动的价值理论”——劳动的自由解放问题。

三、“拜物教”批判:破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幻象”

在马克思这里,《资本论》的“劳动价值论”批判和“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批判,必然要走向“拜物教”批判,亦即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有两个本质规定:一是颠倒的和虚幻的意识,二是掩盖和否认矛盾。在此意义上,“价值规律”(看不见的手)和“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都是资本主义最大的意识形态。如果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马克思主要是把意识形态与哲学批判联系在一起,对其进行理论的说明。那么在《资本论》时期,马克思则通过“拜物教”批判,将它与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的典型化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实现了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釜底抽薪式的批判。因此说,我们应该在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中,而不是在作为“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对立”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之真谛。

虽然“意识形态”这个术语在《资本论》中并不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常见,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细致分析,特别是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对于我们理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运作和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却具有根本性意义。苏联学者鲁宾指出“拜物教理论的本质是马克思全部经济学体系,特别是他的价值理论的基础。”^⑤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就以“木头变成桌子”为例,形象地说明了商品拜物教的实质。木头做成桌子,可桌子还是一个普通的可感觉物的木头,但桌子一旦作为商品出现,就转化为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成了一种很古怪的东西,从而“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强调,人们

①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42页。

② [英]阿瑟《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57页。

③ 同上书,第64页。

④ [美]施特劳斯、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李洪润等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819页。

⑤ 转引自赵敦华《马克思哲学要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38页。

在商品的世界里膜拜自己双手的产物,正像在宗教世界里膜拜自己头脑的产物一样,马克思把这叫作“拜物教”。所以,“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①。而对于拜物教得以产生和形成的真正原因,马克思超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处在于他认识到: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但它却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②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野里,这一人与物之间关系的颠倒的虚幻形式,也正是资本主义社会拜物教的实质,而拜物教又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实质。所以说,资本主义社会不仅表现为实质性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还表现为观念性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拜物教。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基本的“颠倒”,即死劳动控制活劳动这一事实,必然会产生出相应的颠倒的观念或歪曲的意识,这种观念或意识“由于真正流通过程的各种转化和变形而进一步发展了”^③。可以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歪曲和颠倒的形式表达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现实: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鼓吹的自由和平等的表象,正是其具有压迫性和不平等属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资产阶级一方面用商品等价交换形式的平等和自由瓦解和替代了高高在上的宗教形式的意识形态控制;另一方面自己却又变成了作为“抽象”——商品——“非神圣形象”对人的统治的牺牲品。即便是作为“商品世界的完成形式”的货币和“拜物教的完成形态”的资本,同样是“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④。可以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就是用来为现代社会这些公开而明显的新型统治关系提供合法性的工具。但资本主义的商品拜物教,只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初级阶段,资本拜物教才是其最高阶段。也就是说,只有发展到“生息资本”时,资本才真正变成了马克思所说的“自动的物神”,才“取得了它的最表面和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⑤。拜物教才获得了它完全的意义。因此,确实可以说拜物教在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承担了某种“宗教的角色”。

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根本体现的拜物教,一方面体现了人与物颠倒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又以虚幻的形式掩盖了劳动与资本、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早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就明确批评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只有“天然的”和“人为的”两种制度,作为“天然的”资产阶级制度与作为“人为的”封建制度相对立。国民经济学家之所以说现存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因为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发展生产力和生产财富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因此,在国民经济学这里,“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⑥。正因如此,国民经济学家就在现实的经济领域里实现了黑格尔在思辨的思想领域里所谓的“历史的终结”,国民经济学与黑格尔哲学要么是非历史的,要么是超历史的,它们最终殊途同归了。后来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又批评法国的社会民主派犯了同样的错误:“社会民主派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民主共和制度并不是为了消灭两极——资本和雇佣劳动,而是为了缓和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抗并使之变得协调起来。”^⑦在此,马克思看到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及其掩盖和缓解资本与劳动之间矛盾的最终目的。这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宗旨背道而驰。在马克思深入经济学历史的研究之后,更是全面而深刻地认识到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否认资本与劳动之间矛盾的实质。马克思批评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经济学领域的辩护士和代言人,“就在于伪造最简单的经济关系,特别是在于不顾对立而硬说是统一”^⑧,甚至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李嘉图也不懂得他所论述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的真实意义,而庸俗经济学家更是“千方百计力图通过空谈来摆脱反映矛盾

①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90页。

② 参见[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9—90页。

③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3—54页。

④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93页。

⑤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440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12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8卷第152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6卷(Ⅱ)第571页。

的思想”^①。由此可见,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和辩护士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借助于伪装起来的意识形态来掩盖现实中的矛盾,让人们以对资本为代表的“非神圣形象”顶礼膜拜,资本一跃而成了现实中的上帝。可以说,正是由于意识形态,导致资本家和工人都“不能透过假象来认识这个过程的内在本质和内在结构”^②。在此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掩盖了“表面过程的地下暗流”。正是针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这一隐秘性质,马克思意识到了破除其虚幻性任务的艰巨。为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工人与机器的关系为例,特别强调了完成这一任务的艰巨性:工人要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从而学会把机器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是需要经验和时间的。^③

在马克思这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对现实的颠倒的虚幻反映,既掩盖了自己产生于其中的社会矛盾,也借此保证了自己存在的合法性。所以,要想消灭意识形态,仅仅靠消灭观念是不够的,还应消灭观念得以产生的现实社会关系:“要从人们的意识中消除这些观念,只有靠改变条件,而不是靠理论上的演绎。”^④因此,只有当造成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社会矛盾被实践地解决的时候,该意识形态才能得以消失。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私有制正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得以产生的基础和温床。为此,马克思主张必须在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通过工人阶级的协作生产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而“重建个人所有制”^⑤,以此才能敲响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才能剥夺剥夺者,才能揭开作为拜物教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神秘纱幕”,亦即摧毁了关于自由、平等和私有财产之间隐秘联系的这种“意识形态的幻觉”,才能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马克思虽然很少正面教育工人阶级如何培养阶级意识,但他的《资本论》就是一面镜子,映射出了资本主义非人道的剥削在工人阶级身上留下的非人性的、陈旧肮脏的阶级烙印。工人阶级要想解放自己,不但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还要克服和抛弃自己身上一切落后和肮脏的东西。对此,马克思特别强调,革命之所以必须,一是因为除了革命,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二是因为推翻统治阶

级的工人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⑥所以,工人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真正解放自己。在此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资本论》就是“一本培育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生动教科书”^⑦。按恩格斯的说法,正是《资本论》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追求自身解放的条件。因此说,《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革命”也是一场“意识形态革命”。在意识形态革命的意义下,《资本论》的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完全可以更换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或“法兰西意识形态批判”。所以说,正是在《资本论》的意识形态批判和革命的唤醒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对剩余价值的争夺必将演化成一场无产阶级追求自身解放的阶级斗争,亦即“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的胜利,或“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资本的政治经济学”的胜利。也因此,作为工人阶级解放的“圣经”的《资本论》,才成了未来共产主义的“助产婆”。

(白刚: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暨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教授;郜爽: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史清竹)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6卷(Ⅲ)第557页。

②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189页。

③ 参见[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9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卷第45页。

⑤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74页。

⑥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3页。

⑦ 赵敦华《马克思哲学要义》第363页。